为什么要学习研究世界史

□ 钱乘旦

我们为什么学习世界史、为什么研究世界史？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根本问题。自从世界史学科在中国形成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并有各种各样的答案。有人因兴趣而学，有人因寻找职业而学，有人为发表论文进行研究，有人则考虑职称晋升，更多的人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尤其是年轻学者，他们进入世界史学科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从小学、中学一路走来，因缘汇聚走进了这个领域，至于这个领域的意义是什么、功能在哪里，他们似乎真的没有考虑过。所以，我们有责任阐明学习和研究世界史的意义。

历史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提倡以史为鉴、以古鉴今，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对今人有训诫作用；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教益，有助于人们少犯错误、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都知晓司马迁这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许多高校会把这句话镌刻在历史院系醒目之处，警示中国历史学人勿忘学术传承。在中国历史上，著名历史学家都践行这个原则，比如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就很典型，他明确指出历史是镜子，学历史、写历史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如果把中国历史学的源头定在孔子的《春秋》，那么“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中的目标指向就非常明确。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形成很晚，在中国两千多年撰史传统中，并没有“世界史”。19世纪中叶中国遭遇西方列强入侵，国运濒危，这才唤醒了当时一批志士仁人，他们发出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呼喊，中国的“世界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因此这个学科刚出现，就表现出极强的经世致用特征。当时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救国自强、免于外国欺辱入侵？于是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那些西方国家如何强大的经历，试图为中国寻找出路。这样，关于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历史发展就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起先只是介绍知识，后来关于这些国家如何强大、如何扩张的研究和诠释也逐步开始，以至“世界史学科”最终形成。由此可见，中国的世界史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它的特点非常显著，就是学以致用。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传统体现得尤为鲜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正是从世界史学科中发展出来的，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等人所做的工作便是其中的代表。世界史学者从各国历史经验出发，探讨改革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为改革开放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回顾当时的情形，围绕改革的认识和讨论并非没有阻力，肯定改革的意义亦需要勇气。然而，正是世界史学者们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体现了学以致用的优秀传统和忧国忧民、为国解困的责任意识。现在，我们依旧需要继续弘扬这一传统。

在中国学术界，世界史学者首先关注并开展国外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制度、贫富差距缓解、生态环境治理等具体问题的研究。近代以来，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较早开始现代化转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诸多教训。世界史学者通过研究和介绍这些情况，结合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探讨如何借鉴他国的经验，取其所长、避其覆辙。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现代化进程，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参照。

尽管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学以致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今天仍需要提出我们为什么学习世界史、为什么研究世界史这个问题。新一代学者正在成长，他们需要明确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方向。最近二三十年间，国际历史学界发生许多变化。其中，历史学的“碎片化”趋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碎片化意味着否认体系的必要性，不承认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不少历史学者会只专注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小话题，至于这个话题有没有现实意义、有没有学术价值，几乎是无所谓的。于是，历史研究变成了纯粹的个人兴趣，历史成了一大堆碎片，失去其整体性。这种趋势给国际史学界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中国学界尤其在年轻学者中间也有一定市场，与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背道而驰。对于这种倾向，我们要明确反对。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史学科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学科有一个共同之处，都以外国问题作为了解和研究的对象。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一些学者，担心区域国别学会冲击世界史学科，分散世界史学科的人力、经费、研究力量、学术注意力等。但二者实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区域国别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以下三门基础课作为重要支撑。第一门是外语。这不仅是指英语——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是当代学者都应掌握的基本语言工具。对区域国别学来说，“外语”是指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本地语言。第二门是历史。相关学者尤其要深入了解对象国或地区的历史，缺乏对当地历史的认识，就很难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更难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著作。外国的历史恰恰属于世界史范畴，因此，对区域国别学来说，世界史非常重要，它是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三门课是到当地去学习和生活。对相关学者来讲，这不是简单的“田野调查”，而是长期在那里生活、学习，了解当地社会，和当地人交朋友。这三门基础课显示出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学科之间的诸多共通之处和密切联系。同时也说明，世界史学科深厚的学术积累，能够为区域国别学提供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知识与研究基础。

但世界史和区域国别学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世界史是研究型学科，更侧重基础知识的积累与历史过程的研究。区域国别学是应用型学科，更强调应用，着眼于解决我们面对的各种问题。二者的关系有一点像理科与工科之间的关系：理科侧重基础研究，奠定基础理论和知识框架；工科则在理科研究的基础上解决具体问题，如修路、架桥、造船、制造芯片等。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分工与合作，各自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这就要求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做到经世致用。回答“世界之问”，正是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和区域国别学必须承担的主要任务。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无论是世界史还是区域国别学，都应该更加主动承担起回答“世界之问”的重担。更好回答“世界之问”，正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学者们不能辜负这个使命。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

史学评论

乌兰察布：清代北疆民族融合的纽带

□ 崔思朋

清代乌兰察布盟“东至锡林郭勒盟，南与归化城土默特和伊克昭盟相邻，西界阿拉善厄鲁特旗，北至土谢图汗部和赛音诺颜部，大体相当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后旗、五原县、固阳县、武川县等”。从地理区位来看，乌兰察布位于北部边疆中部，处在中国南北方往来的大通道上，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这一时期，生活在乌兰察布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血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往互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心理基础。

清朝的边疆治理转变为北疆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清朝疆域辽阔，“极盛时的疆界东极库页岛，西至葱岭，北达外兴安岭，南抵南海”。康雍乾三朝在西北军事行动的胜利，使中国疆域成功跨越了北方农牧交错带并持续向北及西北地区拓展。与之相应，清代统治者改变了“重中原，轻边疆”的传统治国理念，在北部边疆采取了“以藩为屏”的治理策略。康熙帝在上谕中明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由此可见，清朝基本废弃了用长城维系农牧社会秩序的做法，长城内外的广大土地逐渐成为生活在北部边疆各民族交流互动的核心区域。

在清朝的有效治理下，北部边疆出现了“蒙古臣服，统入八旗，如行内地矣”的和谐局面。这不仅为生活在北部边疆的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及长城南北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社会条件，而且推动农牧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内地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前往蒙古草原谋生，农耕、商贸等活动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这些活动在促进北部边疆开发建设的同时，也有利于内地与北部边疆的交流互动，推动了北部边疆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包括乌兰察布在内的北部边疆中西部地区，既是走西口移民的主要迁入地，也是万里茶道的重要途经地区。这“提高了当地（边疆地区）的人口密度，并使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变化”。正如费孝通所说，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动，是通过定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乌兰察布因其所处地理区位的独特性，成为清代农牧各民族在北部边疆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

乌兰察布成为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加速了民族融合。清代以来，途经中国北方草原的丝绸之路进入了以万里茶道为表现形式的新阶段。万里茶道形成于17世纪中后期，全程长约1.3万公里。它由东南沿海至内地并延伸至北部边疆，成为中国南北方不同地区及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纽带，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清代的发展。万里茶道并无固定线路，只要是向北通往蒙古或俄国的商贸路线都可纳入进来，形成了纵横交错分布并深入草原腹地的商贸线路。其中，经由张家口向北延伸的商路途经乌兰察布地区，使其成为万里茶道途经北部边疆的重要节点。

这一时期，乌兰察布地区出现了大量因商贸活动而兴起的城镇。比如张皋镇，“雍正五年……镇中街道迂回，市廛秩溢，整洁亦不及隆盛庄。全镇商号现有二十余家，以粮粟、烟茶、油酒、花布为主要营业”。又如位于草原腹地深处的四子王旗，既有通往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官府路道，也有经土牧尔台、商都、张家口，通往北京的官道，商运驼队经常穿行于境内，来自“山西、河北、归化城等周边地区的肩挑商贩及旅蒙商，千里迢迢经可可以力更、乌兰花和科布尔到王府、大庙等召庙经商”。这些络绎不绝的商贸活动为南北方跨区域人口流动及不同民族在乌兰察布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持续互动的媒介和载体。清人钱良择途经张家口时对商贸往来带动张家口及周邻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记述道：“自明时岁受蒙古之扰，逮我朝满汉为一，蒙古诸色人等出入贸易如一家人，故其民安业，日以繁庶。”

在万里茶道的影响下，北部边疆与内地的风俗习惯互相渗透，由经济上的相互补充发展为文化上的认同融合。清代陈逢衡以诗人的敏感和想象，勾勒出万里茶道带来的繁荣与祥和：“色目竞夸蒙古集，珍奇远至恰图阵。自从一统无中外，稳睡华夷百万民。”无论生产还是生活方面，汉蒙等各族人民都出现了深度交融，形成了相互依存且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

北疆民族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自古以来中国疆域内出现过的所有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共同缔造的。尤其是农牧民族的互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

清代乌兰察布作为农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区域，在内地移民及商贸活动的带动下，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强。《察哈尔与绥远》载：“自雍正间起，内蒙各地，逐渐设置厅道州县，官制一如内地。”清政府通过制度层面的调整，把乌兰察布纳入与内地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以制度化方式实现了对该地区的常态化管理。

清代以来，乌兰察布的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接受与认同，农牧民族在生业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日趋淡化。美国人柔克义途经乌兰察布时记述道：在黄旗海附近，“这些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比我曾经到访过的任何部落都更接近汉人”；在卓资县十八台镇附近，“这里只有两家简陋、冷清的小客店，由蒙古人经营；他们像这一带大多数察哈尔蒙古人一样，能够流利地说汉语”。此外，乌兰察布的社会风气受农耕文明的影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集宁县，“居民多务农，故其风俗敦厚，俗尚俭朴”。再如丰镇县，“在乡村者，民情敦厚，习尚勤俭，故于衣、食、住日常生活上，极为简陋。只布衣粟食，以求御寒果腹”。四子王旗也有“春种夏锄，秋收冬贮”的习俗。迁入乌兰察布等地的汉族民众在饮食、语言及风俗等方面亦受到当地蒙古族的深刻影响。根据民国时期关于绥远省的调查报告，“本县居民多由山西迁移者，因开放年代较早，移民遂成土著，语言亦早脱离山西语，而成一种本地语”。

有清一代，作为北部边疆由牧转农或农牧结合的重要区域，乌兰察布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生产、生活不断深入到文化、风俗及血缘等层面，这不仅促进了北部边疆区域性多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而且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国家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

中华春秋

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 陈 渊

近期，“Gung Ho”（工合）一词重新走入公众视野。这个在英语里形容“同心协力、干劲十足”的常用词，并非土生土长的英语词汇。它源自80多年前，那场席卷中国大后方、支援抗战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中国人更熟悉它的名字：工合。从后方工厂的昏黄油灯到太平洋战场的泥泞战壕，从经济救亡的本土实践到跨洋传播的文化符号，“工合”二字承载着抗战岁月的集体记忆，也诉说着中美等国在反法西斯阵线中的协作往事。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诞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工业城市相继沦陷。战前中国工业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仅上海一地便集中了全国民族资本工厂的50%、全部资本额的40%、全年产额的46%，而内地的西康、青海、宁夏等省份还没有近代工厂。日军的占领与破坏使中国近代工业损失惨重，大后方军需民用物资极度匮乏，同时约350万失业工人和数以千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亟须生产自救。

正是在这一危急形势下，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人，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提出了“以工业合作社组织后方生产”的方案。1938年3月19日，海伦·斯诺在上海率先提议：“应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并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合起来，自行管理，而工业合作社就是最佳选择。”这一构想很快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响应。同年4月3日的“星一聚餐会”上，与会者一致赞同，成立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委托艾黎起草组建计划。

1938年5月，艾黎起草的“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合运动的计划”，先后获得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明确支持，这份计划成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核心组建纲领。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建立3万个工业合作社，将沿海沦陷区流出的数百万失业工人和上千万难民组织起来，以小型、可移动的半手工业生产模式，填补沿海工业被毁后的产能空白，为持久抗战积蓄生产力量。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同年年底协会迁往重庆，正式组建理事会。理事会成员跨越党派，有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人，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名列其中。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努力干，一起干”为口号，核心使命是组织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的难民、失业工人组建工业合作社，生产军需民用物资支援抗战。

此后，一场以民间为主导、国际力量为支撑，兼具生产支前、难民安置、社会改造多重功能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堪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民间经济领域的重要实践。

遍地开花的工业合作社。1938年8月，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当月，艾黎便派卢广绵等人赶赴陕西宝鸡，筹建第一个办事处。1938年8月24日，宝鸡十几个打铁工人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宝鸡打铁合作社。不到两周，织布、铁器、烛皂、药棉、印刷等十几个合作社相继成立，短短三个月内西北地区就建立了80余个小工厂。为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顺利开展，1939年，宋庆龄与陈翰笙等人在香港成立国际性民间组织——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旨在通过接受国际援助支持工合运动。

工合的火种，迅速从西北蔓延至全国。1939年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先后设立西北、西南、东南、川康、云南五个大区办事处。之后又调整为七个区。到1940年6月，工合组织已覆盖16个省份，设立工业合作社1612个，社员21330人。鼎盛时期，全国建立工业合作社近3000个，社员达25万之多，遍及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18个省。工业合作社的业务涵盖纺织、服装、化学、矿冶、机械、五金等十大类114项，其中纺织业占比最高，达34%。它们产出的军需民用物资，撑起了大后方的半壁江山。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工业合作社历年制造的纺织、榨油、印刷等各类机器及农具达12万余具，帆布、军布及各类民用布匹达8万平方码，军用毛毯达150万条，军服、军鞋及日用服装达上百万件。仅西北工业合作社1940年的月生产能力，即达棉布110万尺、棉毯7410条、军毯或毛毯35700条，机器社可制造织布机144台、蒸汽机2部，制革社可产底皮2270张、面皮3480张。除此之外，大批手榴弹、刺刀从作坊里运出，各型枪支也试制成功，直接支援正面战场与敌后游击战。

工合运动走的是“以生产代救济”的路子。数十万难民、失业工人、伤残军人在合作社找到生计，后方的社会秩序也因此得以稳定。正如宋庆龄向世界各地的援华机构和国际友人介绍工合运动的重要作用时所说：“工业合作社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即令日本完全占领了我们一切的大都市，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

工合运动不仅在国统区迅速铺开，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蓬勃展开。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成立“工合”延安事务所，这是工合运动在解放区的第一个落脚点。短短几个月，延安地区就建起15个工业合作项目。边区用艾黎留下的1500元资金和20000元贷款，五个月内就办起了纺织、军装、肥皂、制药等多个项目，月产军装13500件、军帽1580顶、肥皂4000条。新四军军长叶挺1939年致信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时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即工合事务所）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他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基地。”合作社工厂用简陋的设备和最原始的工艺，硬是“铁匠铺造出手榴弹”“纺车织出军衣布”，将分散的手工业者凝聚成支持抗战的经济防线。

“工合精神”的跨太平洋传播。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是连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关键人物。1938年，卡尔逊以军事观察员身份访问中国，深入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地考察了八路军的治军模式。1940年，他又跟随艾黎赴东南、西南考察工业合作社的实际运作。根据地的见闻与工合运动，使他对“官兵一致、共同协作”的“工合精神”产生了强烈认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受命组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他直接将“Gung Ho”定为部队口号，在训练中借鉴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和官兵平等理念，这支队伍因此被称为“工合营”。1942年，这支部队奇袭马金岛，以小股兵力完成突袭作战，一战成名。之后部队开赴瓜达尔卡纳尔岛，在丛林之中长途转战，以灵活战术打击日军，在南太平洋取得多次胜利。“Gung Ho”随之在美军全军流行，成为形容部队士气高昂、团结协作的标志性军语，并由此进入美国大众日常语言。

战后，“Gung Ho”一词正式成为英语通用形容词，常用来描摹同心协力、热烈进取、充满冲劲的状态。它见证了二战时期中美文化的双向交流。那份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精神从中国出发，经战场实践反哺回英语世界，完成了一次跨太平洋的文化传播。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从战时生产转向和平建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穿越战火岁月，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启示，并不止于一套工业合作制度，更在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民，秉持互助共济的信念相向而行。

史话环球